

# 从董卓形象的塑造看《三国演义》的评价系统

邓莹辉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在东汉政坛上,董卓堪称是翻云覆雨,炙手可热的一代枭雄,而在《三国演义》中,他则被塑造成一个被彻底否定的人物形象。由此可以见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体现了作者崇德尚智的价值取向、民族文化的优越意识和儒道合一的美学理想,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认识价值的人物评价系统。

**关键词:**董卓;《三国演义》;道德;智谋

**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4)04-0024-04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清代章学诚认为它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丙辰札记》),因此,许多人甚至把它当做真实的历史来对待。然而,它毕竟不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作者根据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重新塑造的历史,是作者所创造的一个可与三国历史对应但已经不能等同的小说艺术世界,加入了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具体说来,《三国演义》是将“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和渗透民间理想的政治标准紧密结合的产物。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无论是作者所塑造的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典型,都体现出强烈的倾向性。在众多的人物塑造中,作者很少对某一个形象作绝对的褒贬评判,如褒之为“义冠古今”的道德完人关羽,也有刚愎自用的人性弱点;贬之为“汉贼”的一代奸雄曹操,在作者心目中仍不失雄才大略的领袖风范,但在所有人物的描写上,董卓是个例外。

董卓在三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尽管由于他在群雄争霸中扮演主角的时间不长,《三国演义》对他的描写也不算太多,但与其他否定性人物或多或少都有可以称道之处的情况相比,在有限的篇幅里,作者根据自己的是非标准和创作需要,对历史进行增删,从而给予这一人物的完全是否定性的评价,把他写成为一个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的独夫民贼。我们不妨通过小说描写和历史记载的比较,看看作者是如何具体塑造这一形象的。

董卓的活动集中在前十回。作品从第一回中写董卓被黄巾军打得大败,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救了董卓回寨。卓问三人现居何职。玄德曰:“白身。”卓甚轻之,不为礼<sup>〔1〕</sup>。〔P.6〕所表现出的忘恩负义,轻视贤才开始,对其道德行为作了全方位的揭露和申讨:他荒淫暴虐,紊乱朝纲,“董贼潜怀废立图,汉家宗社委丘墟”<sup>〔1〕</sup>〔P.18〕;率兵入京师洛阳,废汉少帝,立汉献帝,专断朝政,不仅“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威福无比”,而且“绞死唐妃,鸩杀少帝”,“奸淫宫女,夜宿龙床”;<sup>〔1〕</sup>〔P.19〕他挟持献帝迁都长安,尽驱洛阳百姓,使其“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sup>〔1〕</sup>〔P.29〕;面对招安降卒,“卓命于座前,或断其足,或凿其眼,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百官战栗失箸,卓饮食谈笑自若”。总之,在罗贯中笔下,董卓是一个“欺天罔地,灭国弑君,秽乱宫禁,残害生灵;狼戾不仁,罪恶充积”<sup>〔1〕</sup>〔P.23〕,“上欺天子,下虐生灵,罪恶贯盈,人神共愤”<sup>〔1〕</sup>〔P.43~44〕的家伙,因此当他被杀死后,“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sup>〔1〕</sup>〔P.45〕,非此无以发泄心中的切齿仇恨。那么,作为东汉末年的一代枭雄,董卓难道一点长处都没有,或者说他天生就是一个为人不耻的逆贼?我们不妨翻开历史,对他的发家史作一番推根溯源的探究了解,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真象,还原出一个相对原本的董卓来。

收稿日期:2003-12-15

作者简介:邓莹辉(1964-),男,湖北巴东人,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董卓出生在边鄙凉州一个豪族之家。“卓有才武,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sup>[2](P.171)</sup>其力量之强,骑术之精,堪称是长于骑射,以鞍马生活为主的凉州杰出人物中的典型。《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还说“(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汉书·董卓传》以此为基础,增加了“以健侠知名”、“为羌胡所畏”等语,说明他不仅是一名游侠之士,而且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为“羌胡”所畏惧。汉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sup>[3]</sup>。自此以后,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东汉政府的军事行动,逐渐取得高位,包括拥有一支精锐的子弟兵——凉州部队。在与羌族的战争中,他与司马尹端于永康元年并击内犯之羌人,“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这次战争,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战后,董卓“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土。’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sup>[3]</sup>。由此可见,董卓并非仅有“才武”的一介武夫,而是具有大将或统帅的才能和风度。他之所以能够组成以他为中心的凉州军事集团,并进而控制东汉政府,原因就在于此。

为了控制朝政,当时辅政的大将军何进听从袁绍的建议,召集手握重兵的董卓等率军前来洛阳,威胁太后同意诛灭宦官。但董卓尚未抵京,东汉政府已经发生内乱,何进为宦官所杀,宦官亦为袁绍所消灭。董卓进京后,充分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和政治才能,采取高压和拉拢双管齐下的手段,如诱使吕布杀死惟一可以在军事上与他分庭抗礼的人物丁原,并迅速兼并了并州军队,从此,董卓凭借所掌握的武装力量,成为具有条件控制东汉政府的惟一权力人物。虽然在袁绍的号召下,十六镇诸侯曾发动讨伐董卓的战争,也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他的统治地位。董卓的最终失败,主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在于军队内部并、凉两支力量的矛盾激化。东汉政府中身居高位而又对董卓阴怀不满的司徒王允等巧妙利用了这一矛盾,借吕布之手杀了董卓。

由此可见,董卓这一历史人物,并非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只是一个专事杀戮,荒淫暴虐的草莽形象,而是一个既能领兵打仗,又熟谙政治谋略,并濡染很深边鄙夷风的一代风云人物。这种认识上的错位,充分证明历史阐释与历史本身的非同一性。那么,作为历史人物的董卓和作为文学形象的董卓之间,为什么会有比较大的差距,罗贯中为何要把董卓这一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全盘否定性的处理?本文并

不打算作翻案文章,而是试图从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的角度出发,探讨罗贯中如此塑造人物形象的深层原因。

笔者认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体现了罗贯中独特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评价系统。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表现在崇德尚智的价值取向上。大凡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留下鲜明的印象,即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都是以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作为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刘备、关羽、张飞是如此,而罗贯中倾注情感最多的形象,《三国演义》中真正统摄全书,反映作品价值取向的人物诸葛亮更是为蜀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集忠贞、信义、勤勉、坚毅、睿智、机敏于一身的千古道德楷模。就崇德一面看,“《三国演义》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低,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sup>[4](P.28)</sup>。为君者应宽厚仁爱,礼贤下士;为臣者则应忠君报国,恪守信义。虽然他偶尔也曾借他人之口宣传“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的政治主张,用刘备以人为本的具体行为一定程度突破了儒家的正统观念;但从整体上看,这种价值取向带有明显的封建社会的时代特征,表现出作者作为受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传统知识分子无法避免的思想局限。然而,罗贯中毕竟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经历了元末明初的长期动乱之后,他通过对三国时期那一段波诡云谲的历史的深刻反思,逐渐认识到乱世中道义伦理作用的有限,从而对自己的道德至上主义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在完善人物的道德人格的同时,越来越突出智慧的重要性,完成了叙述中心从道德精神的阐扬到智慧谋略的颂赞的转换,于是前期那些有勇无谋的忠臣形象逐渐被智慧型英雄所取代,像诸葛亮那样人格高尚,智慧超群的经纶济世之士,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即便在道德上完全被否定的曹操,罗贯中还是充分肯定其作为“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sup>[1](P.113)</sup>的英雄素质:他有坚韧的追求目标,有洞察全局的胸襟,有笼络人心的手段,有在危境中伪装自己的本领,能克制个人的情感冲动,不计小辱,不虑小失。署名“蛮”的《小说小话》云:“魏武雄才大略,奄有众长,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而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刘劭《人物志》曾对

“英雄”下过一个定义：“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文武茂异的曹操是当得起“英雄”这一称号的。

三国时代是一个“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激烈动荡时期。治平重德行，有事赏功能。要在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纷繁复杂，各种情况瞬息万变的乱世中立足并获取最终的胜利，除了依靠强力和个人的道德人格魅力外，更重要的是要善于运用智谋顺时乘势，随机应变。曹操运用自己高人一筹的机智与权变，创造了一个曹魏历史时代；孙、刘利用手下谋士的睿智，建立了三分天下的伟业。而在一个需要道德更需要智慧的时代，董卓在与天下群雄争霸的过程中，凭借自己强大的军力，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但进京后，他将“民为邦本”之说视为“乱道”，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sup>[1](P.29)</sup>他专肆不仁，残害忠良，秽乱宫禁，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其德既不足以服众，其能又智短力拙，既无通观全局的襟怀，又乏笼络民心的方法，难当领袖群伦之重任，因此当祸起萧墙之日，也就成为他的灭亡之时。很显然，作者之所以略去董卓的创业阶段，而将其控制东汉政权时期所犯下的罪恶作集中的凸显和放大的艺术处理，使其成为罪恶的化身，就是希望通过善与恶、仁与暴、智与愚的对比来显示个人素质的高下，达到褒贬臧否人物的目的，并彰显作家源于儒家思想又注入时代新质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从根本上说，在《三国演义》的形象体系中，董卓之流只不过是主要人物的陪衬或者反衬而已，是作者阐释历史，表达既定观念的道具。

其次，表现在华夏正统的文化观念上。《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在我国历史上，元代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异族统治下，汉民族人民饱受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人格歧视，人心思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思汉情结，既是民族认同意识的体现，也是渴望大汉盛世重现的潜意识流露。罗贯中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族知识分子，且亲身感受过异族统治的残酷，这种感情会更加强烈。因此，他在阐释三国历史时，是用他所生活的时代的视阈和语汇，对古代历史作一种充满创造意味的反求构造的。

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毁誉参半，褒贬适度，全盘肯定和否定的人物很少，董卓是少数几个被彻底否定的反面形象。何以如此？窃以为还与他的出身有很大关系。前面已经说过，董卓生于凉州，长于骑射，以鞍马生活为主，被当时人

称为“边鄙之人”，含有轻蔑之意。他长期生活在这个特殊地区，“习于夷风”，与“羌胡”杂处，而且被视为“羌胡之种”<sup>[3]</sup>，与内地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被讲究温柔敦厚、典雅和美的中原文化阶层看做是低层次的粗鄙之人。在作者的意识中，中原才是国之中枢，汉族文化才是文明的最高体现。这是中国人固有的自大思想，以为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是礼仪之邦，余皆不过蛮夷戎狄，即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一样的意识。民族文化历史悠久的优越感和现实生活中政治地位低下的屈辱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罗贯中独特的评价人物的方式。如同《三国演义》中所拥的“刘”，已经不是单纯的某一个具体的人，而代表的是华夏民族，代表的是有着一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所反的“曹”，也不仅仅限定于曹魏集团，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喻意，它指代的一种僭越的行为，含有否定元人统治的意义。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中说：“如果我们不把‘民族主义’这个词语过度限制在政治意义上，而扩大到文化意义上的话，这种古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有时几乎就相当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sup>[5](P.123)</sup>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对中原人士和对边鄙之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作者对董卓及其凉州部将李傕、郭汜等的彻底否定，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元朝统治阶级的厌恶乃至仇视。

再次，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看，《三国演义》的形象体系由三类人物组成，第一类是刘备集团的成员，作品把他们写成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的正面形象，寄托着作者的政治理想；第二类是以曹魏和孙吴两大集团为代表的人物，作品或褒或贬，尽管倾向性很明显，但没有绝对化；第三类是以董卓、吕布为代表的“习于夷风”的边鄙人物，作品对他们完全是厌恶和痛恨的态度。对三类形象的情感态度是如此的截然不同，源自于作者的审美追求。罗贯中将儒家的以德统美，以理节情，德美合一，情理综合的美学思想与道家的崇尚自然，追求虚静，以柔克刚的审美理想相结合，通过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行为的审美观照，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他所肯定的，是那些道德高尚，胸襟宽阔，智慧超群，性格内敛克制的人物。诸葛亮的竭忠尽智，关羽的义薄云天，刘备的仁德诚信，都是作者所称扬的；曹操“横槊赋诗”的潇洒儒雅，周瑜“火烧赤壁”的镇定自若，孙权的知人善任，亦为作者所充分肯定。尤其是在中心人物诸葛亮身上，作者赋予了他几乎所有的美德：他自出茅庐，毕其一生，为蜀

汉事业忘身忧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忠贞的典范;他在政治上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提出的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成为刘备集团自始至终遵循的基本路线,显示出绝世的才能;他在军事上运筹帷幄,奇谋迭出,妙计丛生,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是智慧的化身;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虽“功盖三分国”,却为人极其低调,从不居功自傲,个性张扬。罗贯中所推崇的是诸葛亮式的既德才兼备又文质彬彬,既具有儒家仁爱进取的精神又有道家清净无为的流风的人物。用这一标准来衡量董卓、吕布等人,他们在道德上损人利己,见利忘义,是人格卑下的“三姓家奴”;在政治上,是谋反篡逆,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在才智上,是有勇无谋,目光短浅的一介武夫;在个人修为方面,缺乏教养,没有文化,头脑简单,个性张扬,与温文尔雅,刚柔并济的儒者风范不啻天壤之别,故而受到作者的斥逐。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对董卓等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对历史作出的充满创造性的阐释,体现了罗贯中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形成了一个独立自

足的人物评价系统,建立了一种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为后人提供了成功的艺术经验,《三国演义》一书也就成为我国古代塑造特征化艺术典型的范本。这也说明,任何创作主体在理解认识同时也是阐释历史时,先验的既定的观念在人们意识到它之前就已经占据了人的头脑的事实,每个人都凭借着他所处的时代提供的经验去了解过去。所谓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尚且如此,更何况演义历史的文学作品呢。《三国演义》对历史事件的取舍,体现了罗贯中用心处不在时事之纪实,亦步亦趋复印历史,而在写出心中理想的和否定的人物,以此反省历史,警醒当世。

#### 参考文献:

- [1]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1986.
- [2]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5]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韩玺吾

## A Study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Story of Three Kingdoms from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Dong Zhuo

DENG Ying-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DongZhuo was well known to be a shifty, formidable and powerful man in Dong Han dynasty, but he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totally negative character in *The Story of Three Kingdom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thinks the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Story of Three Kingdoms* embodies the novelist's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worship of ethos and wisdom, superb idea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esthetic thought of the unity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t form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characters with particular cognitive value.

**Key words** DongZhuo; *the Story of Three Kingdoms*, ethos; wisdom